

“新消费”井喷 挑起经济增长大梁

□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

随着经济转型深化、互联网技术发展、居民收入增长,新消费形态呈井喷式发展。两会期间,一些代表委员建议,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提高服务业供给水平,加大减税力度,增强市场监管,扩大改善型消费市场,充分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“牵引力”。



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/韩景丰

消费升级需求旺盛

“互联网为消费提供了很多便利性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,互联网为购物提供便利性,扩大了消费范围,也带来了消费心理的变化,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欲望。在网购的同时,发展了线下送达服务,带动了快递、外卖等

相关产业发展。

“在‘互联网+’时代,居民对教育、文娱等精神层面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加。”中信建投证券宏观固收首席分析师黄文涛预计,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将体现在很多方面。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

高,医疗健康的需求潜力将进一步释放;5G、人工智能、无人驾驶等技术变革将催生全新的交通、通信需求,且中国有望成为引领者;随着绿色、环保、健康的食品供应体系的建立与完善,食品消费升级需求方面蕴藏较大机遇。

特别是在养老托幼领域,发展空间巨大。有专家认为,未来5年至10年是我国养老服务行业发展的黄金期。居家养老将是国内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重点,催生上门护理、居家智能养老设备、适老家居改造等新消费需求。

补齐服务类消费短板

“家庭消费需求正经历升级过程,呈现‘四增一减’的结构性特点和发展阶段性特点。但目前国内消费市场并未做好升级准备,面临供给不足问题。”民建中央提案建议,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补齐服务业供给不足的短板,提升高端服务业供给水平;鼓励地方政府针对地区消费升级特点出台相应支持政策;继续降低关税,加大消费特区的建设力度;加强国内市场的监督管理,持续改善消费

环境;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,促进消费升级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表示,传统的大众消费一定程度上已达到饱和,基数太大,增速就会放慢,所以要激发其他消费,尤其是对提高生活品质有帮助的服务类消费,包括教育、文化、医疗、旅游、生态消费等。他呼吁,逐步建立一个完整的反映居民消费品质、消费结构变化的消费统计指标,指标中可计入的因素包括

老百姓如何利用休闲时间、如何享受文化生活。建立指标后,逐步引导百姓适度增加当期消费,减少储蓄率,引导百姓树立消费信心。

“尽管网络消费带来便利性,但同样具有信息不对称问题,有时难以保证质量。这种情况下要注意市场监督,保障消费者权益。”刘尚希强调,政府应与平台企业携手,通过运用大数据杜绝假冒伪劣产品,真正让消费者放心消费,让消费发展有更大起色。

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表示,未来经济将转向消费驱动,经济发展要反映在生活水平的提升上。他认为,消费中的服务类消费占比有待提升,包括出行、医疗服务、文化消费等。发达国家,如美国、韩国、日本,服务类消费占整体消费比重约60%以上。为让服务业更好地满足快速上升的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,在供给侧,应当在服务领域开放竞争,让民营资本、国外资本加入。

着力提升居民收入水平

未来的消费增长点在哪里?刘尚希表示,消费可以分为刚性消费与改善型消费,刚性消费是必须满足的,改善型消费则与百姓的钱包息息相关。真正扩大消费要在改善型消费上做文章。在他看来,改善型消费具有弹性,会受到收入、就业、对未来预期等情况影响,收入水平下降、失业等因素会导致改善型消费减少。因此政策需要让钱包“鼓起来”,保证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GDP增长。

今年,国家发改委将从多方面促进消费

平稳增长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日前表示,将落实促进消费的政策;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,研究推出居民增收三年行动方案;扩大重点领域消费;改善市场消费环境。

对于扩大消费的领域,宁吉喆介绍,一方面,要促进实物消费升级,包括推动老旧汽车报废更新,继续执行新能源汽车购置政策,加快开展5G商用部署,鼓励支持绿色家电消费;另一方面,促进服务消费扩大,发展壮大旅游产业,扩大文化电影娱乐消费好势头,拓展体育健身健康消费新空间,

满足养老消费、育儿消费、家政服务消费需求,促进城镇消费提质扩容,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等。

刘俏表示,除了保证收入水平提高外,还要保证收入分配差距缩小,控制房价,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,让百姓愿意消费。

收入分配改革是一项大工程。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建议,一是要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,稳步推进城市中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;二是完善最低工资制度,防止企业通过延长工时办法规

避管制;三是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;四是缩小收入的体制性差距,包括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,深化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。

此外,全国政协委员、贵州省政协副主席、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左定超表示,应当发展完善个人消费贷款政策,扩大消费信贷规模、提供利率优惠、大幅度降低消费信贷成本,为壮大消费基石提供坚强的金融支撑。具体而言,可以增加贷款形式、降低贷款利息、延长贷款期限、灵活还款方式。

“就业优先”强化政策协调

□本报记者 叶斯琦 赵白执南

对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,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15日在两会“代表通道”上表示,这是就业优先政策的升级版,提升和改善了宏观经济政策体系,使政策体系有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目标。

两会期间,多位代表委员表示,随着我国劳动力供需形势变化,就业总量矛盾逐步缓解,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不容忽视。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,要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,强化政策协调,加大对重点人群的就业帮扶,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新就业形态,促进高质量就业。

强化对重点人群就业帮扶

“随着我国劳动力供需形势变化,就业总量矛盾逐步缓解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党组成员王一鸣表示,从供给看,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以来累计减少约2800万人,每年农民工净增加人数由2010年的1245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184万人。从需求看,经济平稳较快增长,服务业占比不断提高,就业容量持续扩大。不过,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和产业调整升级,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更趋突出,企业裁员和招工难、“有人没活干”和“有活没人干”并存,部分领域、行业、地区就业压力更趋突出。

在这一情况下,哪些是稳就业政策关注

的重点?王一鸣认为,是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的外贸出口企业,产能过剩行业、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地区,以及农民工、中低技能劳动者和高校毕业生等群体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莫荣建议,对重点行业、重点企业岗位流失情况实施动态监测,及时制定应对规模失业的预案。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就业产生较大影响时,及时调整相关经济政策,从源头控制失业。

“对易受到外部冲击和去产能过程中面临困难的行业,应采取加大稳岗补贴、开发公益性岗位等措施保障就业,同时发挥好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的托底作用。”王一鸣表示,加大对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地区的支持,通过促进创新带动就业、专项技能培训引导职工转岗就业、鼓励新业态发展吸纳就业等举措,缓解就业压力。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落户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鼓励返乡创业,稳定农民工就业。扩大高职院校招生规模,创造公平就业环境,合理引导预期,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。

加快发展职业教育

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,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,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。在摩根士丹利华鑫首席经济学家章俊看来,2019年要继续加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、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,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。

“要加强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,降低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。加强对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,提高劳动者竞争力。加快推进高技能人才建设步伐,建立高端人才集聚和发展平台。”莫荣建议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胡卫表示,应在贫困地区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,使贫困人口掌握脱贫致富的知识和技能,增强其就业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。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,职业教育发展明显滞后。建议设立深度贫困地区高中阶段普及及攻坚计划专项资金,并向中等职业教育倾斜;外引内培兼修,多措并举,提高贫困地区职教师资整体水平;完善多元对口帮扶机制,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;推动产教融合,瞄准重点产业布局职教专业。

新就业形态值得期待

政府工作报告指出,加强对灵活就业、新就业形态的支持。胡卫表示,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应用,催生出新零售等更具灵活性的新兴职业。随着信息技术快速革新升级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正向促进,“灵活用工”就业模式在劳动力市场的占有率和影响力逐步增强。

在胡卫看来,滴滴出行、饿了么等服务业平台形成了大量“灵活用工”。在“双创”浪潮推动下,更多劳动力不再满足于只服务某一主体。新的就业市场发展趋势带来更多机会,政策应抓紧构建“灵活用工”社会保障制

度体系,合理设定相应就业人员的社保缴纳比例及缴纳范围,针对“灵活用工”就业人员收入来源多元化特点,进一步提高“灵活用工”的社保缴纳监管措施和社会保障力度的可行性。

“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,‘互联网+’不断催生新产业、新业态,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、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,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矿业大学(北京)副校长姜耀东表示,例如,美团平台把技术与场景结合起来,让外卖从一天几十万单的小生意成长为每日数千万单的大产业。他建议,大力培育新业态,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,及时总结经验,输出方法论。

“总体布局上,在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,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和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,通过经济增长拉动就业。”莫荣建议,在培育数字经济、新能源、健康等新兴产业中,形成比较优势产业链促进就业。这些行业的特点是产业链长,可以大量吸纳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就业。

此外,对于今年5.5%左右的调查失业率目标,蔡昉认为,我国现在面临比较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,一旦发生需求侧冲击,影响经济增长速度,就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可能低于潜在增长能力。超过5%的部分应该属于周期性的失业现象,这提醒宏观经济政策、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、更加主动,要加大力度。

“放水养鱼” 减税降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

□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

减税降费是2019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抓手。专家认为,大幅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,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“一揽子”减税方案可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。同时,财政支出缺口可通过各种渠道予以补充。

减税降费增强市场信心

“制造业增值税基本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,大致能减税几千亿元,下调力度很大,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,下调制造业增值税税率,一是回应了社会上关于减轻实体企业税费负担的呼声,二是重点支持振兴制造业,抓住了当前实体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、突出矛盾,把减税的重点放在下调增值税税率是非常正确的。

平安证券宏观分析师陈骁表示,以减税方式支持经济增长与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更相符。这是因为,一方面,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新增流动性,可能会加大楼市调控、金融风险防控的难度;另一方面,与扩大财政支出相比,对制造业减税可更直接地减轻企业经营压力,激发企业活力。相比于刺激政策,激发企业 and 市场活力才是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方式。而这也与今年鼓励创新、支持产业升级的方向相符。

中国社科院财经院冯明认为,出台整体性、一揽子减税方案,以明确、一贯之的政策目标为指导,体现坚定的政策意图,能发挥好稳预期的作用。

不会影响财政可持续性

既要减税降费,又要保障重点支出,这会影响财政可持续性吗?有关人士指出,减税降费会对财政收入造成较大冲击,但不会影响财政可持续性。而且,给制造业等基础行业以及带动就业面最大的中小企业明显减税,实际上是“放水养鱼”、培育财源。

两会期间,财政部部长刘昆在记者会上表示,积极的财政政策要“加力提效”,作为财政部门,关键是要做好“加减乘除”这四则运算。其中,最重要的是做好“乘法”,“放水养鱼”,用减税降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,提高居民消费能力。减税降费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,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为明显的降费,更好地引导企业预期和增强市场信心,稳定经济增长。

在刘尚希看来,现在要“放水养鱼”,解决经济转型阵痛,让更多企业挺过难关、过这个坎,有必要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。这种情况下,财政收入减少,财政支出也要相应减速。但财政支出不是全减速,而是优化支出结构,对民生支出要保障,对于三公经费、一般性支出要进一步压缩。同时,通过全面绩效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率,相当于节约了资金,减轻了减税降费给财政带来的压力。

致公党中央建议,进一步精简对企业收费项目并加强监督检查,建议各级政府进一步完善和实施收费目录清单制度并进行动态管理,同时,在此基础上加强上下联动与监督检查,切实降低企业负担。

周振海:建议修订反洗钱法

□本报记者 彭扬

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周振海建议,从扩充洗钱上游犯罪类型、明确特定非金融机构的涵盖范围、明确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工作理念、提高行政处罚的惩戒力度等方面对反洗钱法进行修订,完善部分条款。

具体而言,一是扩充洗钱上游犯罪类型。建议参考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(FATF)《四十项建议》相关规定,在反洗钱法第二条中,将诈骗罪、拐卖妇女儿童犯罪、偷税犯罪、盗窃犯罪、抢劫犯罪、制假售假犯罪等列入洗钱上游犯罪的范围,更好地满足国际反洗钱司法合作的要求,充分发挥对相关犯罪的遏制和震慑作用。

二是明确特定非金融机构的涵盖范围。在反洗钱法附则第三十五条中明确“特定非金融机构”的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、贵金属交易所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公证机构等非金融机构,为推动特定金融领域反洗钱工作的开展提供法律保障。

三是细化部门职责,加强部门之间的反洗钱分工协作。其中包括,在反洗钱法第一章第四条中明确规定“建立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牵头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”,在金融监管部门与公安、安全、税务、监察、海关等部门之间建立以金融情报为纽带、以资金监测为手段、以数据信息共享为基础的监管协作机制;在反洗钱法第二章中明确反洗钱相关部门的范围和具体工作职责。

四是明确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工作理念。将反洗钱法第三章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:“金融机构应当坚持‘风险为本’的原则,依照本法规定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,金融机构负责人应当对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负责”。引导反洗钱义务机构积极主动加强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,提升反洗钱义务机构整体工作有效性。

五是强化义务机构反恐怖融资义务。进一步明确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恐融资义务,充分发挥其在预防洗钱、恐怖融资的“第一道防线”作用。

六是提高行政处罚的惩戒力度。完善反洗钱法第六章“法律责任”中相关条款,通过增加行政处罚情形、提高行政处罚金额上限,增加义务主体的违法成本,真正发挥行政处罚对义务主体自觉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震慑、警示和约束作用。